

摘要: 本文结合中共中央权威文献、官方正式史料和台湾当局的官方文献,参考两岸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公开出版物,对渡江战役后、改革开放前的30年(1949年至1978年)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策略,分四个历史阶段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史 中国共产党 台湾问题 策略演变

中图分类号: E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102-4883-(2012)03-0001-09

CPC's Policy toward Taiwan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改革开放前 中国共产党处理台湾问题的策略演变

□ 王洪光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7月,蒋介石在台湾阳明山设立总裁办公室。这标志着国民党政权的领导核心完成了从大陆到台湾的转移。自起直至1978年大陆实施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中国共产党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策略大体经历了全力准备武力攻台、做好打谈两手准备、谋求和平解放台湾、实施“以打促谈”战略等四个阶段。

一、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全力准备攻台

1949年4月,渡江之后,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尚未解放,中共中央开始认真考虑适时发起渡海作战、武力夺取台湾的问题。

1949年6月14日,中央军委在给第三野战军粟裕等复电时提出对台作战问题^①。21日,中央军委在给华东局和粟裕、张震、周骏鸣的电报中进一步明确:“对台湾要积极进行策反工作,准备内应条件,希望夏秋两季完成各项准备,冬季占领台湾。”^②

鉴于台湾是一个远离大陆的大型海岛,夺取不易。为完成武力夺取的任务,中央未雨绸缪,做好人员和海、空军事力量准备。

为加强海军建设和培养干部,7月2日粟裕发出电令:“为完成攻占台湾任务,必须迅速加强海军,决调赵启民同志前往海军任副政委……必须集中力量培养大批干部,决以陈士榘为军大^③副校长,钟期光为副政委。”^④

为加强空军力量建设,7月10日毛泽东根据朱德的建议致信周恩来:“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⑤

①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471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②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472页。

③ 华东军政大学。

④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473页。

⑤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474页。

就这样,对台作战的预期发起时间由原来的1949年冬季,推迟到1950年夏季。

1949年6月初,第三野战军开始调整淞沪地区部队部署,并在7月30日致电中央军委:“为迅速完成攻占台湾的准备,建议华东海军暂缓北开。”^①8月2日,军委复电同意粟裕的意见,并指出:“你们积极准备攻台是正确的,必须从各方面准备攻台,打破干部中的畏难心理……(攻台时间)必须推迟到我方空海两军(特别是空军)条件充分俱备之时。”^②

10月,先是第10兵团在金门之战中遭到失败,登岛部队全军覆没。一个星期之后第7兵团在浙江舟山群岛之登步岛登陆战中也遭遇挫折。鉴此,中共中央加快了渡海登岛作战所需的海空军准备工作,第三和第四野战军对解放舟山群岛和海南岛表现出了极大的谨慎。也由此进一步推迟了攻台的发起时间。11月20日,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主任粟裕作了题为《关于对台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

继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办公室、国防部、参谋总部、联勤总部等军事机关迁台之后,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行政院也移往台湾。

12月,攻台作战准备继续抓紧进行。17日,粟裕召集三野第7、9兵团师以上干部在浙江宁波开会,作了题为《关于打台湾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究竟什么时候打,要看各方面准备工作”^③。当月,粟裕还在南京召集三野各兵团、军、二级军区参谋长座谈会,研究现代战争条件下陆海空联合作战的军事工作。在这期间,粟裕重点研究了三军联合渡海登岛作战的战法,查阅了10年间东南沿海的水文气象资料,研究了潮汐、气候和沿海地形的规律、特点及其对渡海作战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作战方案和战前准备措施,并数次向军委作了汇报。

进入1950年,粟裕继续将解放台湾及肃清东南沿海岛屿的残敌列为首要任务。为准备攻台,粟裕提出调4个师的兵力,组织一次渡海登岛作战演习。2月10日,身在苏联的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表示同意。

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总统”职,并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周至柔为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为集中台湾的兵力,国民党军于5月13日开始撤离舟山群岛。粟裕于17日签发了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前委“关于攻台准备工作的指示”,指出:“今后敌人可能集中四十万左右的陆军及其海空军全部守备台湾,这将使我攻台的作战准备更加困难,更需要作充分的准备。”^④

经过精心计算,粟裕决定将第7、9兵团作为第一梯队,三野其余部队作为第二梯队,共约5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30万至38万人。相对于岛上守军,在质量上超过国民党军,但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于是粟裕在6月23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从其他野战中抽出3至4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则更好”^⑤。

此前,6月6日至9日,粟裕在北京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他认为解放台湾已经成为全国全军的重大战略行动,请求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台湾战役。毛泽东明确,攻台作战仍由粟裕负责。23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再次请辞攻台战役总指挥:“职实感能力有限,不堪负此重责,为此请求军委直接主持此一战役或请刘伯承、林彪两同志中来一个主持亦可。职在华东范围内当全力以赴。”^⑥

然而,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解放军主要战略方向被迫实施根本性转移,并于不久后出兵朝鲜,攻台作战问题被搁置。

①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475页。军委7月26日致电粟裕提出“海军机构移青岛,并归军委指挥”。

②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475页。

③ 《粟裕文选》,第3卷,29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

④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497页。

⑤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497页。

⑥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498页。

二、1950年6月至1955年2月，做好打谈两手准备

这一时期，虽立足于武力夺取台湾，但不放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50年6月27日宣布调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隔断海峡两岸联系，以武力阻止解放台湾。28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代表中国政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强调“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重申了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

虽然如此，但朝鲜半岛形势危急，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我东北地区的边防安全、甚至整个新中国的安全。为应对这种威胁，我主要战略方向必须由东南调整到东北。同时，美军介入台海，而我海空军力量又极其薄弱、无力应对，这就迫使我调整以武力攻台的基本战略，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又暂未提出。因此，武力攻台的选择虽然还在，但时间已被迫无限期推迟。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央对台工作的主要战略目标是稳定住东南沿海方向，集中力量解决朝鲜半岛问题。1950年8月26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①这说明中央正式推迟了攻台的时间。

此后数年间，虽然中美双方围绕台湾问题不断隔空较量，但事实上已暂时停止了武力攻台的准备。1954年8月27日，中央考虑到美军介入问题，准备调整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步骤：

“中国政府如果解放沿海岛屿，美国政府干涉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要渡过台湾海峡攻打台湾，美第七舰队则是要阻挠的……我们解放台湾，也要从沿海岛屿开始打击敌人。我们总的口号：解放台湾。但要有步骤地进行，因为中国海军还未锻炼好，各方面的准备还需要时间。”^②12月2日，美国不顾中国的强烈抗议，同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指出双方的共同防御区域限于台湾和澎湖地区。这一条约的签订，将

中美关系、美台关系和我解决台湾问题，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中央并未放弃争取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努力。

三、1955年2月至1957年10月，谋求和平解放台湾

1955年1月25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该决议允许美国总统在必要的形势下，以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对澎湖和台湾本岛的进攻^③。鉴于当时中美双方海、空力量的巨大差距，如果对台、澎地区实施渡海登岛作战，难免遭受重大损失。如果按照1954年提出的“有步骤的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首先夺取靠近大陆沿海的金门、马祖等国民党军占领的岛屿，那么就势必导致国民党势力彻底龟缩于远离大陆的台、澎地区，拉远与大陆的地理距离，容易造成台湾海峡两岸的划峡而治，造成“两个中国”。这就正中美国下怀。

3月5日，毛泽东在致电赫鲁晓夫时说：“在沿海岛屿问题解决以后，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就自然地缓和下来，关于台湾问题，也就很难谈出什么结果了……美国想要我们答应不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来交换沿海岛屿的撤退，从而在事实上承认美国对台湾的霸占，并在事实上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我们宁可让美国人在一个时期内事实上占领台湾而不去进攻台湾，但不能承认美国的占领合法化，不能放弃解放台湾的口号，不能承认‘两个中国’。”^④

经过对时局、尤其是对美军介入现实的反复考虑，权衡了利弊之后，中央对台工作思路作了重大的调整。1955年2月3日，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中指出：“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只要美军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

② 《周恩来年谱》，上卷，“在接见朝鲜南日外相时的谈话”，1954年8月27日。

③ 参考：《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二卷）》（上册），437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260页。

撤退,台湾可以和平解放,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什么时候公开提出,要看形势的发展。”^①这是中共中央首次在内部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也开启了两岸关系的新时代。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印尼万隆出席亚非34国会议期间,经中央授权,发表了和平解放台湾的讲话:“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②这一讲话,公开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争取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支持,也在所有关注海峡两岸关系的人心中激起了波澜,其中包括蒋氏父子、李宗仁、章士钊、袁希洛等。

8月,身在美国的李宗仁发表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上海文史馆一位名叫袁希洛的馆员,也委托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通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邢西萍向毛泽东转交了一封信,提出赴京参加国庆观礼。袁希洛是辛亥革命时期老同盟会会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毛泽东答应了:“似可允其来京一行,并参加国庆观礼。此人是江苏教育会派要人之一,似可考虑给以某种名义。”^③

国庆观礼之后,袁希洛提出要见蒋介石,并写了一封信。10月12日,毛泽东批示:“此人要求之(去)见蒋,我说须得台湾许可才能去,因此他写了一封信,似可听其发去。此人书生气很重,人是好人。”^④但这件事情再也没有下文。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⑤他在讲话中对过去属于国民党阵营的人发出了“五个凡是”的号召:“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回到大陆来参观和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

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凡是通过和平途径投向祖国的,中国人民都将在工作上给以适当的安置。”^⑥他还强调:“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⑦

这就将解决台湾问题从口号落实到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在此形势下,在1956年那个生机盎然的春天里,1949年时曾任国民党和谈代表的章士钊,受中共中央委托,携带一封致蒋介石的信来到了香港。到香港之后,章士钊将信件交给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并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许孝炎立即回到台湾,将信件呈报给蒋介石,并汇报了与章士钊会见的情况。

在这封信中,中共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四种方案供蒋介石考虑:

“一、除了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⑧考虑到蒋介石离乡已久,信中特意写道“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言辞之情真意切。

这封信的内容,构成了日后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政策主张:“一纲四目”。但蒋介石没

① 参考:《周恩来年谱(1949-1976)》。

② 1955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30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417页。

⑤ 载《人民日报》1956年1月31日。

⑥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383页。

⑦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542页。

⑧ 叶永烈著:《毛泽东与蒋介石》,469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有作出回应。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报告,为再次举行国共协商以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向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作了郑重的、正式的呼吁:“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①同时,还用相当篇幅向散居在包括台湾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昔日的和当时的国民党要人喊话:自从我们发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以后,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已经不少人表示了他们的爱国愿望……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已经表示再也不能忍受那种寄人篱下、随人俯仰的生活……我们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他们将来的地位就会得到肯定的保证。如果他们还有疑问的话,他们可以通过大陆上的亲友得到解释,或者派人来大陆考查,我们保证他们来去自由。^②

上述所谓的“不少人”中,有一位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1956年4月28日,李宗仁的政治秘书程思远根据李宗仁的指示,应中共邀请来到北京。5月12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和为贵,团结对外。我们欢迎李宗仁先生和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人士都回来看看,保证来去自由。”^③

7月2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中,明确了需要争取的人物范围:“工作重点应该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④

1956年,中共除了与一些昔日的国民党政要接触外,还借助一些境外的媒体人士来传递信息,其中有一人就是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时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香港特约记者曹聚仁^⑤。在曹聚仁来京的几个月间,周恩来前后会见他4次,

毛泽东主席也接见了,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与曹聚仁会谈时需要提出的政策主张等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蒋介石收到章士钊送去的信后,为了解我方的真实意图,经蒋经国提议,找到了蒋经国曾经认识的、身在第三方(香港)的新加坡媒体记者曹聚仁,委托他赴京联系。1956年夏天,曹聚仁给身在大陆的妻子邓珂云写了封家信,并夹带了一封致政务院政务委员、原1949年国共和谈时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邵力子的信,信中表达了自己受“两蒋”委托与我党进行接触之意。

1956年7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接见曹聚仁的有关事宜。16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陈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政务院政务委员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一起在北京颐和园会见了曹聚仁。此后,周恩来又连续与曹聚仁谈了两次。周恩来说:“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⑥

曹聚仁问周恩来,早先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票面”里的实际价值究竟如何?周恩来回答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

①《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381页。

②《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379~382页。

③《毛泽东与蒋介石》,470页,转述程思远的回忆。

④熊华源、单劲松:《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和决策》,载《党的文献》2009年11月。

⑤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蒋畈村(今兰溪市梅江镇蒋畈村)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1922年至1937年,他在上海创办了《涛声》,与李公朴、史良等为救国会领导人之一。1927年与鲁迅相识后成为文友。1938年,他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聘为战地特派员。1941年受蒋经国委托创办《正气日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留在大陆,但次年即移居香港,创办了《新生年代》、《热风》、《循环日报》等刊物。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逝世时,周恩来总理亲拟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赞扬他“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598页。

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①

曹聚仁离京后在香港与蒋经国的机要秘书王济慈见面,转达了北京之行的信息,王济慈也带来了蒋经国关于进一步协商的初步考虑。曹聚仁还及时将北京会谈的有关信息透过他所在的《南洋商报》,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为题作了报道,正式向全世界公开中共希望举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重要主张。随后,他又于9月1日来到北京。10月3日,毛泽东接见了 him:“(台湾)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可照旧……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②10月7日,周恩来第四次会见曹聚仁:“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辞修^③愿意作台湾地方长官,经国只好让一下作副的。其实辞修、经国都是想干事的。辞修如愿到中央,职位当不在傅宜生^④之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我们现在已不公开宣传反蒋……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可以提出,我们是有诚意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他们也拿出诚意来。”^⑤

经过国共两党的连续秘密沟通,蒋介石终于在1957年初采取了更进一步的行动。年初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的许孝炎被召回台湾,蒋介石希望他推荐一人赴大陆进一步了解情况。许孝炎推荐了宋宜山。宋宜山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还是国民党立法委员,而且还是被解放军俘虏的原黄埔一期高才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宋希濂的胞兄。1957年4月,宋宜山从香港入境,经广州乘火车抵北京,并与周恩来总理见了面。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与宋宜山进行了具体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四条意见:“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

峡。”^⑥宋将大陆之行写了一个报告,由于对大陆多有赞誉,使蒋介石感到有些不快。1972年宋宜山赴港参加章士钊葬礼,被蒋介石以“附共”之名撤销了立法委员之职。其兄宋希濂后来也到了美国。

1957年4月16日,曹聚仁又一次赴京,并应邀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为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举行的欢迎酒会。在酒会上,伏罗希洛夫见到了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卫立煌,周恩来在为其作介绍时称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⑦。5月5日,根据“两蒋”的指示,曹聚仁携夫人邓珂云到庐山、溪口参观。庐山,原来是国民党召开重要军政会议的地方,也是蒋介石与宋美龄极为钟爱的疗养胜地;溪口有“两蒋”的祖屋,亲人的坟墓。返港之后,曹聚仁将庐山、溪口之行的印象写成一信致蒋经国,并随信附上所拍的照片。

中共希望重启国共协商的努力为全世界所知晓。但由于某种原因,蒋介石对此予以矢口否认:“和谈”的谣传是共匪凭空捏造,丝毫没有根据的,我已经一再指出,这种谣言完全是由于共匪内部矛盾,伪政权动摇,尤其是大陆人民反共抗暴的革命形势高涨,无法遏制,只有藉这一和谣,才能暂时安定大陆民心,维系其共匪政权,故这和谣今日在共匪,几乎视为其惟一的护身符,所以必须不断的捏造下去。至于和谣中的人物,无疑的是为了要使谣言造得逼真,所以才挑选经常和我接近的人。这不过证明共匪不择手

① 2009年10月10日,华夏经纬网,“曹景行:父亲和我见证的台海波涛”。

② 熊华源、单劲松:《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和决策》,载《党的文献》2009年11月。

③ 陈诚,字辞修。

④ 傅作义,字宜生。

⑤ 《毛泽东与蒋介石》,475页。

⑥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623~624页。

⑦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43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段的卑劣无耻而已。^①其实,蒋介石这样说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美国人极不情愿看到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极不情愿看到这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脱离自己的控制驶向中国大陆,而美国又是国民党政权赖以苟存的唯一支柱。因此,蒋介石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公开承认他和中共接触。

恰在这时,中国大陆地区开展了“反右”运动,一批民主党派人士、文艺界人士被打倒,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正处于初步沟通阶段的国共两党接触。或许正是受此影响,1957年10月,国民党八大召开,正式拒绝中共的提议。

四、1957年10月至1978年底,实施“以打促谈”战略

国民党八大对中共和谈的拒绝,使得两岸之间的关系渐趋紧张。1957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印度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们始终没有放弃武力解放,但是我们天天在广播:和吧,我们都是中国人……结果他们不来。他们总是要打,我们总是要和。打不打不成,和也和不成……他喊要打便于向美国要钱。我也打不成,因为那里有水,我们的军队是在陆地上作战的,不是在水上作战的。”^②这或许也是对国民党当局拒绝接触的一种回应。

1957年,国民党当局开始连续派飞机侵入大陆沿海重要城市和内地活动,并空投大批反动传单和“慰问品”,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副总参谋长陈赓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布置空军和各军区今后必须采取一切积极有效的措施,对可能入侵内地的蒋机给以应有打击,并力求将其击落。”^③毛泽东批示:“请你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请考虑我空军一九五八年进入福建的问题。”^④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台湾问题重新摆上了中央军事战略关注的首要位置。1958年3月5日,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经军委、空军党委和福州军区党委讨论,均同意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关于考虑我空军一九五八年进

入福建问题的批示,并且拟在七八月间开始行动。同时准备必要时轰炸金门、马祖。”^⑤

6月26日,总参作战部向总参谋长粟裕作了电话汇报:“福州军区判断,国民党军最近可能对我组织一次大的火力袭击。据此,福州军区提出两项应对措施。一是消极方面的,采取撤离等防范措施,高炮加强对空作战。二为积极方面的,即组织还击。”^⑥粟裕指示,除火炮防敌袭击外,另调一些高炮部队,集中火力打击敌飞机,如有机会再打地面目标。并同意作战部关于积极进行还击准备,待敌暴露目标后狠狠给敌以打击的建议。

7月27日,毛泽东就炮击金门问题致信彭德怀和副总参谋长黄克诚: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⑦

如果说这是中央在考虑怎么打的问题,那么8月18日,一切准备都已就绪。8月13日,军委准备在深圳方向进行实兵演习。18日,毛泽东致信彭德怀: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东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⑧就这样,1958年8月23日,金厦海峡两岸此后持续了20年的炮战正式打响了。国共两党直接接触的努力暂时宣告失败,军事敲打战略走上前台——谈不拢,那就打一打,打够了再谈。

谈不拢,既有与国民党谈不拢,也有与美国谈台湾问题谈不拢。“以打促谈”,是中央对美、对台促谈策略。9月6日,毛泽东说:“你美

①《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谈话”部分之“中华民国四十六年”。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357页。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370页。

④《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370页。

⑤《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379页。

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391页。

⑦《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407页。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409页。

国过去谈判那么冷淡，中断了好几个月，现在你想谈，那好，可以谈。我们不打，它就不想谈，要把这个绞索捏紧一下，它感觉到痛了，它说，好好好，我们来谈吧。你不捏紧，它就不谈了……它每天紧张，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样干。那好，就谈吧。”^①

“以打促谈”是毛泽东对美的“绞索政策”，增加了蒋介石集团拒绝美国要求停火和从金、马撤退的资本，把美国拖在金门、马祖这根“绞索”上不得脱身，挫败了美国对两岸“划峡而治”的阴谋。中美谈判始于1955年周恩来万隆会议讲话之后。1955年7月25日，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与美方代表进行大使级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8.23”金门炮战之后，1958年9月15日，中美双方代表在波兰华沙复会。就在此时，国民党方面再一次派曹聚仁来到大陆。但中共中央并不像上一次那样热心了。毛泽东在10月11日给周恩来的信中说：“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他，待酌。”^②

曹聚仁在京期间，毛泽东于10月13日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起草了给福建前线部队的命令：“炮击金门，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③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以打促谈”的对台策略。就在同一天，毛泽东会见了曹聚仁，并对他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们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④席间，章士钊说，如果这样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可能断绝。毛泽东对此表示“我们全部供应”。

1961年，毛泽东在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时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最初思想：“如

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再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⑤这是中央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是中央对台工作指导原则的重大调整，是邓小平“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前提与基础，也开启了改革开放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大门。

1963年，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再提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主张——“一纲四目”：（“一纲”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⑥

两年后，1965年7月20日，通过程思远与中共多年来的工作，李宗仁终于从美国回到了祖国大陆。周恩来总理到机场迎接李宗仁及夫人郭德洁女士，毛泽东主席在7月27日与李宗仁夫妇进行了谈话，着重谈到：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⑦

李宗仁毅然决然的回归，深深地刺激了孤悬台岛16年的蒋介石。中共中央调查部1965年7月30日编印的《调查通报》第872号登载了一位台湾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419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44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440页。

④熊华源、单劲松：《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和决策》，载《党的文献》2009年11月。

⑤《毛泽东外交文选》，46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⑥《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88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41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人士对李宗仁归国一事的评价：“李宗仁回国，是共产党统战政策的一次胜利，是毛泽东‘爱国不分先后’这个动人号召的胜利，影响无疑是很巨大而又深远的。李宗仁这个抉择，聪明而正确。他的勇气是应该佩服的。……从大处看，中共政权坚如磐石，回去还有什么不安全？就是个人的身后历史，最后还可以得到弃暗投明的褒扬。……据我观察，李宗仁这次回去，是他多年苦闷、徘徊、观望、等待的结果。香港、台湾都有许多不得意于蒋家王朝的人，这些都是大大小小的李宗仁，他们看到李的行动及北京的反应，当然不会无动于衷。”^①

这一年，蒋经国破天荒地亲临香港，与曹聚仁密谈，然后亲自带他觐见蒋介石。蒋介石、蒋经国、曹聚仁三人就和平解放台湾问题举行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谈话。这次谈话的相关内容尚缺乏原始档案的支持，但流传出来的六项共识，足以震惊世界：

（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3个师驻台湾。

（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障只可提高，不准降低。^②

这“六项共识”，可望洞开国共和谈的大门，迎来和平解放台湾的曙光！

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客观上再一次关闭了国共和解、两岸统一的大门。此后，虽然双方还曾做出一些尝试，但都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1972年章士钊奉命赴港协商，但不足一个月即病逝在港。1975年初，行将就木的蒋介石感觉来日无多，于是授意陈果夫再次向中共传递信息。在没有得到中共回音的情况下，陈果夫便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如果我是毛泽东》一文，呼吁重启两岸谈判之门，促成祖国统一。

岁月不饶人，不久之后，毛泽东、蒋介石先后辞世。

1979年元旦，国防部长徐向前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停止炮击金门。两岸关系就此进入一个新的难以预测的时期。

作者：王洪光，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

责任编辑：肖显社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423页。

^②“解放后，国共两党的三次秘密和谈”，2010年04月28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